

五四翻译理论史

● 平保兴 著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

五四翻译理论史

平保兴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四翻译理论史/平保兴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8

ISBN 7-5034-1428-6

I.五… II.平… III.翻译理论—研究—中国—当代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07349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责任编辑:于保政

印刷:山东省审计厅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65

字数:18.5千字

印数:1-2000

插页:2

版次:2004年8月第1版

印次:200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7-5034-1428-6/G.0230

定价:26.00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几乎人人都想要
定下一条翻译的公式来为后人造福。

——叶公超：《论翻译与文学的改造》

引 言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翻译成为外国文学在我国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当时文学革命有个显眼的现象:无论是作家个人还是文学社团,都和外国文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或社团不翻译外国作品,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或社团不推崇一个以至几个外国作家,并且自称在艺术风格上受到他或他们的影响。”(唐弢:《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同时,五四译者和翻译理论者,没有忘记建设自己的译学理论。一方面,他们总结前人翻译中的得失。另一方面,他们结合本身的翻译实践,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的译学理论,来丰富自己的翻译经验,从而促进了我国译学理论的发展。

著名作家孙犁,生前曾这样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五四文学运动以来,不论在小说戏剧,诗歌翻译,我们都可以整理出一定的成果。”(《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学》)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知道:五四新文学有不少尚待我们研究的领域。

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五四时期的翻译理论研究,整体上说,深度不够,也不全面,更无系统性。1989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锦厚先生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该书主要从国别的角度,探讨了外国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并没涉及翻译理论的问题。1992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陈福康先生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是国内第一本系统论述中国历代译学理论的著

作,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其中也涉及到了五四时期名家的翻译理论。但是它属于通史,因此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近年来,在国内的学术刊物上,我们偶尔能见到一些探讨翻译家的文章,而专论五四时期翻译家及其翻译理论的文字却寥寥无几。有鉴于此,在进行大量研究调查之后,笔者发现,五四翻译理论还值得一书。

这里,首先有必要交代一下关于撰写此书由来的问题。上世纪末,我有幸参加了《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史》的课题研究。在撰写《五四译坛与俄罗斯文学》一书时,我原想把翻译理论的内容写进去。后来考虑三番,觉得不妥,因为五四外国文学翻译涉及面很广。它不仅包括俄罗斯文学,还牵涉到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日本文学、印度文学、瑞典文学等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文学。正因如此,我删去了翻译理论这一章节,将之搁置一旁。在完成上述之书后,我腾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又做了一番较为细致的资料搜集工作。在此基础上,我就着手撰写《五四翻译理论史》一书。

写史先得划定时限。这是我想谈的第二个问题。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五四’时限有因人而异的划分标准。有的将上限回溯至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下限划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的将十月革命爆发作为上限;也有的把1915年9月《青年》杂志(《新青年》杂志的前身)的创刊作为上限。但多数学者持有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下限的看法。本书将采用“两立”的时限,即从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创立,至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

在简单地说了一下时限的划分之后,我想再说一说关于此书的写作方法。本书是“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史”的子课题,为全面论述五四时期中国翻译理论的一部史稿。写这部书时,我首先遇到的是:翻译理论史怎么写?这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从目前学术界的情况来看,它主要有二种方法:一是“以

人带史”，即按历史发展的先后，挑选出一些重要的译论者分别介绍和评论。二是“以论带史”，即以自己设计的理论框架来写。陈福康先生在《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中指出，这两种写法都各有优、缺点。但目前学术界大多采用其中的一种，作为自己的写作方法。至于如何扬长避短？作者在此书中没有作明确的回答。这一问题自然引起了我的好奇，让我着实思索了一番。我认为，我们可以采用“人论皆史”的方法。所谓“人论皆史”，是指“以人带史”和“以论带史”两种方法同时使用于一书的写作之中。一是，我们必须梳理出一条关于译学理论的主线，它能凸现出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二是，读者也能了解到某译者或译论者在这一时期发表的译学观。这一方法，既可克服“只见树不见林”的缺点，又避免了“只见林不见树”的不足，让读者同时能“见林见树”。本人认为，断代史不妨可以采用此法。

方法既定，那么，全书的框架也就见出。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从宏观的视角出发，介绍了五四时期的翻译理论，并且对此作了系统的概述，基本上勾勒出这一时期翻译理论的一条主线。它串联了那时主要的翻译理论：翻译与创作，翻译的目的性、选择性和系统性、翻译的语体，翻译中的直译、意译、重译和风韵译、翻译与文化、译者与作者、读者，译者与原作和译作的关系，翻译与批评等等。

下编，从微观的角度，论述了这一时期重要的译者和译论者发表的各种译学观。这一时期，我国译坛出现了不少译者和翻译理论者，如梁启超、蔡元培、胡适、刘半农、茅盾、周作人、郭沫若、郑振铎、宗白华、傅斯年、罗家伦、张东荪、邵力之、朱自清、沈泽民、胡愈之、许地山、耿济之、张松年、熊之真等人。他们发表的译论，构成了这一时期主要的翻译理论，又成为本书考察的主要内容。读者通过他们的论说，能较为全面地了解到五四时期他们各自在译学

上的主张和翻译思想。

综观五四时期的翻译理论史,我们可见如下的主要特征:

(一) 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有序的、相互关联的进程。五四之前,翻译中的意译、述译、改译等方法,使得翻译质量下降,给翻译界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翻译家林纾首当其冲,受到了五四翻译界严厉的批评,因此,直译的主张在当时得到了确立。周作人、鲁迅、胡愈之、茅盾等人都提倡直译,于是五四时期直译蔚然成风。它纠正了先前的翻译中偏于意译的倾向。比较而言,五四译作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同时,译者水平参差不齐,采用的翻译方法又各异,有的译作偏离原作精神,译文有误,五四译坛随之兴起了翻译批评。从意译到直译,直译和意译并重,以及翻译批评可知,翻译理论的发展有着前因后果的关系,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它既是对传统翻译方法的继承,又是对传统的扬弃和自我完善。

(二) 五四的翻译理论尚处于一个形成的初始阶段。那时尚无论述翻译理论的专著,译者和翻译理论者发表的大多是零星的译论。他们往往有感而发,畅所欲言。言论或来自翻译实践,或来自翻译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一个人在报刊上先提出的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往往引起同行的共鸣。接着,大家各抒己见,展开热烈的讨论。1921年,茅盾、郑振铎、沈泽民在《小说月报》上关于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就属此类。1920年,宗白华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起了译名的讨论,后来该报刊登了不少讨论译名的文章。当时讨论十分活跃,论者态度也非常诚恳。除了在报刊上进行讨论,他们还以通信的方式,发表自己的看法,如周作人与茅盾,郭沫若与田汉、宗白华、张东荪等人,胡适与陈独秀,等等。至于讨论结果如何,是否真正解决了问题,对于他们来说,无关紧要。也正因如此,诸如译名统一,呼声很高,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但问题迟迟得不到真正的解决。与此同时,当时发表的译论大多是零散的,缺乏系

统性,因此探讨的深度不够,译论还很幼稚。从当时发表文章的字数来看,四、五百字的文章居多,而像朱自清、茅盾、郑振铎、沈泽民等人洋洋洒洒的几千乃至上万字的文章实为罕见。

(三)五四翻译理论充满着浓郁的时代特性。这种时代性表现在翻译文体的转变,翻译与创作的关系,翻译的目的性,翻译的选择性,翻译的系统性。它们都与新文学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朱自清在《翻译事业与清华学生》一文中说:“我们的新文化,不用说,全是‘外国的影响’;而外国的影响又几乎是从翻译的文书来的。翻译事业的重要,盖可想见。虽然西方文书的翻译,明末清末两个时期中均已有之,但译手之众,流行之广,和我们的时期相比,究竟差得太远了。”(《朱自清全集》第四卷)“我觉得新文学的运动,不仅要在创作与翻译方面努力,而对于一般社会的文艺观念,尤须彻底的把他们改革过。”(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由翻译到模仿,由模仿到创作——成为文学改良的一条必由之路。而翻译与文学改良紧密相连。中国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在翻译与创作关系问题上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

(四)五四翻译理论明显不同于以往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注意到了译者的重要性,强调了作者与原作、译者、译本和读者的关系。在作者与原作,译本和读者的关系中,译者起着关键性的决定作用,承担的责任最重最大。他们既需对作者负责,又要对读者负责。为此,译者既要忠实原作,又要了解作者所属民族的文化特性,用地道的本国语言,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原作的思想和精神,让读者读懂译文。傅斯年、茅盾、郑振铎、郭沫若等人,对译者肩负的重大使命,都一一作了论述。

(五)五四翻译界开始引进国外和其它学科的理论,不断地充实和发展自己的理论。“神韵译”就是典型的一例。神韵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观念。茅盾将之输入五四翻译理论中。他

指出,文学作品最重要的艺术色就是该作品的神韵。翻译应当体现出作品的这一特色。他又从理论的高度来探讨这一问题,提出了“形貌”和“神貌”的关系。郭沫若提出了“风韵译”。他认为,诗歌翻译应该译出诗的韵律。此外,五四之后,陈西滢、傅雷等翻译家对这一问题都有过详尽的论述。郑振铎首次给国人介绍了著名爱尔兰翻译理论家 A. F. Tytler《翻译原理》中的三个翻译法则。蒋百里参照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事业,来指导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翻译,认为,翻译是“一种有主义之宣传运动”,并且“负有创造国语之责任”,“翻译事业之成功者在历史上有永久重大之光荣。”(《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翻译事业之先例》)此外,刘半农、周作人、茅盾等人的译论,还涉及了文学作品翻译中言语习气、风俗习惯的问题,强调要保持原作的精神。它们实际上又牵涉到翻译与文化的理论问题。可以说,五四翻译界对翻译理论的引进和探索,拓展了译者的视野,丰富了我国的译学理论,同时也反映出一种开放、容纳的接受心态。

如果本书能折射出那一时代翻译理论的一点亮光,能使读者对五四翻译理论史有一个概要的了解,能不辜负前辈对我们后学者一片殷切的希望,那么,我就感到欣慰了。书中如有疏漏或不当之处,诚望行家不吝赐教,不胜感幸。

目 录

引 言	(1)
-----	-------

上编 五四翻译理论的宏观审视

第一章 翻译的时代性	(3)
第一节 翻译与创作	(6)
第二节 翻译的选择性、系统性和计划性	(13)
第三节 翻译的目的性	(19)
第四节 翻译语体：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	(25)
第二章 译书的方法	(29)
第一节 直译与意译	(29)
第二节 重译	(32)
第三节 神韵译	(35)
第三章 翻译与批评	(37)
第四章 翻译与文化	(46)
第一节 译名的统一	(46)
第二节 翻译中的文化现象	(52)
第三节 翻译与“欧化”	(55)
第四节 译者、作者与读者	(62)

下编 五四译论者与翻译理论

一 周作人：开新纪元译书的模范	(67)
二 刘半农的译论贡献	(81)
三 胡适：主张翻译外国文学名著的第一人	(92)

四 矛盾的翻译理论·····	(99)
五 郭沫若的译学观·····	(109)
六 郑振铎的译论贡献·····	(118)
七 胡愈之的译学观·····	(125)
八 傅斯年:译书感言·····	(130)
九 罗家伦:译外国小说者的四件事·····	(135)
十 宗白华:翻译丛书及译名观·····	(142)
十一 陈望道的译学贡献·····	(147)
十二 沈泽民:论译文学书·····	(151)
十三 张东荪:论译书和译名·····	(156)
十四 恽代英:关于丛书编译的主张·····	(159)
十五 邵力子:译书的我见·····	(162)
十六 瞿世英:论诗歌的翻译·····	(165)
十七 张闻天的译学观·····	(168)
十八 陈大悲:剧本的翻译问题·····	(172)
十九 朱自清:论译名·····	(175)
二十 许地山、耿济之的译名观·····	(181)
二十一 孙几伊:论译书方法及译名·····	(187)
二十二 沈子善:对于译书的我见·····	(191)
二十三 蔡元培的译名观·····	(194)
二十四 于鹤年、祖基、光典论译书·····	(197)
二十五 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	(202)
二十六 陈独秀和钱玄同的译名观·····	(205)
结束语 五四翻译理论的启示·····	(210)
附录一:五四译论参考目录·····	(214)
附录二:参考文献·····	(221)
后 记·····	平保兴(225)

上 编

五四翻译理论的宏观审视

我以为,我们对于“五四”时代作一个广泛的精密的研究,是十二分地必要的。对于“五四”时代的成业,我们是应当作个正确的批判和一个真实的再现。自然,“五四”运动,是一个整个的社会运动,而不止于是某一局部的运动。我们从各方面在各领域中,去作“五四”时代之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 穆木天 :《“五四”文学之研究工作》

第一章 翻译的时代性

如前所述,我们称 1915 年 9 月 15 日《青年》杂志的创立,至 1921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这段时期为“五四”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国内国外都相继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巴黎和会、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等。

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伴随着外来思想的传播、各国文化的输入和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影响,中国国内思想界开始活跃,出现了一股改良社会的思潮。一批有识之士,纷纷撰文立说,试图拯救国家与民族的危亡。1919 年 1 月 1 日,《新潮》登载了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文章,如《人生问题发端》、《今日之世界新潮》、《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今日中国之新闻界》、《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等等。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充盈着忧国忧民的意识,表达了莘莘学子赤诚的爱国之心。傅斯年在《新潮发刊词旨趣书》中说:“中国社会,形质极为奇异。西人观察者恒谓中国有群众而无社会,又谓中国社会为二千年前之初民宗法社会,不适于今日。寻其实际,此言是矣。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今日出版界之职务,莫先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今试问当代思想之潮流如何?中国在此思想潮流中位置如何?国人正复茫然昧然,未辨天之高地之厚也。”金兆梓的《我之社会改造观》(《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十二号),十分真实地描述了那时我国思想界的种种现象。该文说:“自世界大战之结果,产生思想界之革新。此

种新思潮,挟其澎湃汹涌之势,沛然直卷入于吾国而莫之能御。吾国有志之士,久苦于政治之黑暗,社会之消沉。本来已有迎新之机,至是遂如乡斯应,树之风声,不崇朝而波糜全国。五四之后,更加如春雷一震动,万蛰皆惊,无在而不呈其怒茁之象。与吾墨守习俗礼制之旧社会,处处觉得格不相入。于是改造改造之声,几令人耳欲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胡适也十分关注局势发生的变化。1919年12月1日,他在《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中,引用尼采的话,指出,这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时代。他认为,评判态度是新思潮运动的共同精神,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是评判态度的最好解释。它表现为二种趋势:一、讨论社会、政治、宗教和文学上的种种问题。二、介绍西洋的新思想和新学说。他还列举了当时出版的刊物和专号,如《新青年》的“易卜生号”、“马克思号”,《民铎》的“现代思潮号”,《新教育》的“杜威号”,《建设》的“全民政治”,以此来说明上述观点。他又分析说,有些人对西洋学说深信不疑,以研究问题作为出发点,希望通过输入西洋学说的手段,去达到再造文明的目的。

也正因如此,西洋学说在中国广为流传。但是,当时一些人不做具体研究,胡适分析了这些人的心理后指出,他们“觉得翻译现成的学说比较容易些,故乐得做这种稗贩事业。”于是,翻译事业随之兴盛。

西方学说在中国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其中,翻译的功绩自然不可抹杀,它对传播西方学说起了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翻译是中外文化与思想传播的媒介,与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的时代因其内容和特征各异,会产生新的文化现象,并且赋予翻译新的内涵。五四时期的翻译与新文化运动紧密相连,具有下列论题:翻译与创作、翻译的选择性、目的与功能、翻译的语体、翻译的

系统性,等等。它们不同于以往的翻译,成为译界论争的焦点。本章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论述,以揭示这一时期翻译理论的内容及其特质。

